

# 论传统儒学与刘光弟的政治活动

陈大士

(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, 四川 南充 637002)

**【摘要】** 刘光弟是戊戌变法时期著名维新志士,也是一位清正廉明、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封建士大夫。他的政治思想明显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,但就其思想基础而言,仍是传统儒学。

**【关键词】** 刘光弟; 儒学; 维新变法;

**【中图分类号】**K256.5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A **【文章编号】**1673-1883(2005)01-0059-03

刘光弟(1859—1898),四川富顺人。1883年登进士,后在京任刑部主事,1898年在戊戌政变中被杀。综观其在京为官十余年的政治思想活动,一方面他继承了传统儒学,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传统儒学的超越。对此,本文试作一些探讨。

## 一、崇尚节俭、勤学笃行的儒家风范与现有的政治成格水火不入

刘光弟自1888年在京为官到1898年戊戌政变前夕,据他给自贡盐商刘举臣的信中所述,他常步行十二里至署,每月出勤二十八九日,家中少有荤腥,常啜稀粥,除着礼服外,平日周身无一丝罗,寻常宴会酒食,亦多不至。而他所处的时代,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动,儒家旧有的道德观念逐渐地失去了约束力,整个士大夫阶层奢糜享乐。刘光弟日见“弛逐之辈……类无不营求富贵以遂其欲。”<sup>〔1〕(P248)</sup>但他“力崇朴质,磨砺清节,睹富贵若睹浮云,居朝市若居深山。”<sup>〔1〕(P248)</sup>为此曾遭不少同僚和他官的嘲讽,而他处之怡然。刘光弟深明儒家“俭以养德”的道理,时刻以古人遗训来反省自己。

刘光弟为官清廉,认为“清字是官本”,因而“非旧交,虽礼馈弗受。”<sup>〔1〕(P439)</sup>他用费不敷,同乡王抡三补员外,别项进款三四千金,常欲分润,露于言句,他拒辞不受。<sup>〔1〕(P233)</sup>入军机处后,“某藩司循例馈诸章京,君独辞却。”<sup>〔1〕(P440)</sup>刘光弟既不受贿,也不行贿。向例,凡初入军机者,内侍例索赏钱,他持正不与。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,他不贺,谓“时事艰难,吾辈拜爵于朝,当劬王事,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?”<sup>〔1〕(P436)</sup>其正直的品格决定了他不能“摧眉折腰事权贵”。在

晚清黑暗的官场,堪称一代廉吏的代表。

刘光弟勤于治学,主张治学的关键在于“主敬存诚为本”,同时强调还要有为当世,即“上以肩圣贤道统之传,下以开宇宙太平之福。”<sup>〔1〕(P51)</sup>“诚”作为圣贤真道的根本,即所谓“意诚而后心正,心正而后身修,身修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(《礼记·大学》)心诚之外,还要身体力行,即经世治用。他批评汉学家“惟心知向学,不求实用,拘文牵义,摘句而寻章,按格而就局。”<sup>〔1〕(P49)</sup>他对士大夫重利轻义,抛弃传统的价值观进行了揭露:“近正学不讲久矣。道统茫茫,一线几坠……学校以利禄相处,缙绅以文酒相旷达。”并认为:“吾人今日为学,只有闭门读书,澄心观理,不夺于邪说,不摇于俗尚,沉潜反复,涵养既深,驯至道明德立,然后徐出所学,以与海内同志相质正。”刘光弟认为在当今社会要有所作为,就应“精通古人事迹,详究古人史册。”<sup>〔1〕(P51)</sup>因此他刻苦好学,平居折向朱子。工余,全力研读《二十四史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毛诗》及古人、近人政书。

## 二、经世治国的理想,重义轻利的行为和舍生取义的气节浑然天成的结合在一起

### (一) 刘光弟经世治国的理想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的思想根源

刘光弟自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,特别伯父向他讲述六世祖刘伯盛(明朝永乐甲申进士)刚正爱民,为青田民众请命,百姓为他刻碑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直至光弟官京朝后“益知厉向学,思欲为世所用,显扬先人,以无负公。”<sup>〔1〕(P39)</sup>1883年,光弟登进士第一年,他告假归省,自京、津浮

收稿日期:2005-03-27

作者简介:陈大士(1970—),安徽枞阳人,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3级中外关系史研究生。

海到沪,溯江西上回家。在途中他目睹了整个社会的沉沦,到天津“见洋行联络,烟柳露花”,过上海“但闻歌馆酒楼,肉竹相倚,蜂痴蝶怨,玉夜春香”;<sup>(1)(P81-84)</sup>一旦船避风靠岸,他就与流离老嫗、纤烟鬼、聚赌无赖相访身世;他对往来官商,包揽货载,强行“免税”,以致厘税空虚感慨颇深,并由此萌发了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强烈念头。

刘光弟一踏入官场后,便看到了清王朝病入膏肓,统治阶级政治腐败、道德沦丧。他指出:“朝廷一切政事,皆系苟安目前,敷衍了局。”“大臣偷安旦夕,小臣斗巧营私。认真办事者,以为固执而不圆通,上书直言者,以为浮躁而不镇静。甚有因认真而撤去差事者,因直言而革去官职者。”<sup>(1)(P204)</sup>他对众望所归的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感到愤慨和失望,痛切指出:“当此时方多故,国步艰难,为大臣者不思启沃匡扶,持正抗言,乃效前阉宦小人,献媚贡谀之计,中兴元功尚且如此,何问在廷唯阿之众乎?”<sup>(1)(P22)</sup>刘光弟虽然对朝纲不振,官吏腐败感到不满,但自己毕竟是个不能左右大局的小臣,因而发出了报国无门的喟叹。甲午战争后,他一度弃官回乡,但忠君报国的儒家思想催发了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他认为要改变这种颓废的风气,唤取臣心、民心,首先应请“皇上引咎自责,特降罪己之诏,情词迫切,动天下以至诚,痛戒从前积习之非。”<sup>(1)(P3)</sup>他认为只有统治者正其身,才是挽救危局的关键。刘光弟敢于请皇帝下诏谢罪,一方面反映了他忠君的思想,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继承了中国古代“臣论”的思想。对人君的过失,人臣不能无条件地放任,应该“勿欺也,而犯之。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即犯颜直谏。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,光绪帝下诏见刘光弟时,他“对颇详直,力陈时势艰危与中外积弊,非力矫冗滥,无以图治。”还“责备圣躬者甚至。”

### (二)刘光弟反对追逐名利、重利轻利

在晚清黑暗的官场上,士大夫奢利成风,要想摆脱利欲的熏透,保持高风亮洁是非常困难的。刘光弟指出:“义利之辩,精细渺茫,微乎其微,有毫厘千里之势。然只先赞成一个心,故又自积极有把握。”<sup>(1)(P169)</sup>他认为这个心必须以天下国家为念,却除私意。在这一点上,他吸收了陆王新学。陆九渊认为要想成为圣贤,是以发明“本心”;认识“本”心中固有的仁、义、礼、智,只要抓住了这一点,便是做到了“先立乎其大者。”(《象山全集》卷十《与邵叔谊》)只要这个“大者”

能立,其它问题便是枝节了。刘光弟认为“大者”不立,主要来自私利,他曾自我解剖道:“胸中私意,凭是难除细就其源,多是自利之见。”<sup>(1)(P172)</sup>刘光弟生活在国家内忧外患之中,能够发明本心,存心去欲以树立忠君爱国、刷新弊政、抵抗强敌的决心,是千百年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展。

### (三)刘光弟舍生取义,甘为变法而流血牺牲

刘光弟自幼喜听忠义节烈事,母亲闲居辄令光弟诵说《烈女传》中《女戒》诸书,刘光弟深受其影响,他在《赖义士传后书》一文里,称颂赖义士反对清初的剃发令,不惜以身殉国。对明代节烈的颂扬也隐寓着他将尽臣道而献身变革的精神。他说:“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朋友之道,无不贵乎各尽其心,各尽其职。”<sup>(1)(P84)</sup>他将时刻准备像许多忠臣、志士那样,不惜以身殉国,九死而无一悔。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,他目睹“各省京官纷纷出京,几于十室九空,流散情形,不堪目睹!”由此发出了“若犹此泄沓偷安,后来各国生心,东分西裂,何以图存?”<sup>(1)(P225)</sup>的感叹。刘光弟决心毁家纾难,他于是年10月写下了“人人所欲言者,特不敢言耳的《甲午条陈》”准备上呈光绪帝,在眷稿时,刘光弟夫人一再劝他谨慎行事,仔细斟酌,不可冒昧,他置之不顾。由于职小官微,不能面呈皇上,而委托的本部堂官且不肯上呈,相识之御史亦不愿代奏,刘光弟“含血喷天,决眦切齿。”<sup>(1)(P255)</sup>《马关条约》签定后,他感到十分悲观失望,一度产生了退隐的想法,他叹息曰“譬诸大器将倾,意欲起而扶之,而势不能;漠然坐视其旁,而情又不忍,只有决然舍去之一法而已。”<sup>(1)(P262)</sup>1895—1896年他远游半年后,又回到了京城。1898年9月5日,刘光弟被任命为军机章京,得以参与变法。他对戊戌政变早有预料:“因有‘参与新政’四字,遂为嫉妒者逅病,势如水火,将来恐成党祸。”<sup>(1)(P287)</sup>但并未因此畏缩,11日,湖南守旧派曾廉上书请杀康、梁,光绪帝交与谭嗣同驳之,谭嗣同愿以百口之家保康梁之忠,刘光弟并署名曰“臣光弟亦请先坐罪。”<sup>(1)(P436)</sup>刘光弟与康有为仅识一面,而冒死相救,谭嗣同大为敬服。戊戌政变发生后,刘光弟被捕,并于9月28日在菜市口杀害。

### 三、抱守儒学而不拘古泥经,尤其吸收儒学中“变”的思想为维新变法张本

### (一)刘光弟吸收了儒家的“变”的思想来改革当时的社会现状

《易经》是儒家经典中最富有变革理论的书籍,《易》曰:“夫易者,变化之总名,改换之殊称。”但又指出君臣父子之位永恒不变。“不易者,其位也。天在上,地在下,君南面,臣北面,夫生子伏,此其不易也。”(唐·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卷首)刘光弟发挥了《易》中“变”的因素,并把它作用于社会现实。他指出:“惟智者,于此欠利,即于彼改图,或舍其旧而图其新,或开其美以补其恶。”(此中有精意,大而圣贤豪杰,体国经野,小而一人一家一事,莫不概括于其中)他的诗歌中也流露出这种变革的意识“百物气相制,弱肉与强谋”<sup>(2)(卷下 P12)</sup>“变化因得制,在物各有独……道与气为推,天从强弱肉。”<sup>(2)(卷上 P2-3)</sup>刘光弟从自然界“弱肉强食”的生存竞争进而推及到人类社会,即易理所云“穷则变,变则通”是历史发展的趋势。刘光弟对儒学经典的解释触及了时代的主题,但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和环境的限制,因此不可能像康有为一样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。

### (二)刘光弟的变革思想还表现在西学的态度上

刘光弟主张“如是豺狼不化,亦尽可借彼之利器,制彼之要害,总在自强而已。”<sup>(1)(P83)</sup>甲午战争后,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感到改革的迫切性。他大声疾呼:“今倭已形猖獗,恐俄亦隐然思逞。我国如不思所以制之之法蹈常习故,罔肯交通。或稍有经营,不复视为利数……如此欲求外人不侮,内地之无事,得乎?”<sup>(1)(P2)</sup>在政治上,他主张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。他指出中国“官事诸多

不整,君权不行,遂仿照民权之法”其原因“现在归公办理之事,毫不认真,此中国君权不行之故,果能如外国参用民权议院更好。但刘又“恐官绅商民意见不洽,便当别出事端。”观“中国人心大坏,嗜利成风,恐急切不能见效。”<sup>(1)(P266-267)</sup>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议院制度,但又不可太急:“宜待学术大通,性情大同”<sup>(1)(P6)</sup>之后。

在经济上,刘光弟强烈要求改变封建社会“重农抑商”的陈腐观念,发展民族工商业。刘光弟一生的政治活动建立在商业资本的基础上。(光弟为京官,商人刘举臣每年补助光弟银二百两,十年从未间断。)因此,在一定程度上刘光弟是民族工商业的代表。1892年,清政府筹划海防,二百万两银皆有商人捐出,刘光弟对此颇有认识“若把通商讯逐末,国家安得南北洋?”他提出要对民族工商业进行保护“宜劝商人等,集股为轮船公司……及兵轮以护华商,其利尤远。”<sup>(1)(P17)</sup>他认为目前“设关置厘太多之处,宜切实省并,以恤商情。”<sup>(1)(P9)</sup>

刘光弟忠君爱国的思想和清正廉洁的品质都源于儒家思想的影响。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改变现实的需要,他突破了儒家学说的旧框架,从而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、经济改革措施,并且这些都是切中时弊的产物。其社会改革的目的是想通过更新统治手段来加强君主专制,他所期待的民权只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对国民思想改造的基础上,他的“恤商”只是希望统治者对工商业的通融以挽救日益窘迫的财政危机。这又恰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结果。

### 注释及参考文献:

[1]刘光弟集编写组.刘光弟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出版,1986.

[2]袁圣斋诗集[Z].成都:成都昌福公司,刊刻本,1913.

## A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and LiuGuangdi's Political Activity

Chen da-shi

(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,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, Nanchong Sichuan 637002, China)

**Abstract:** LiuGuangdi was a famous person of reform in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of 1898, and was also a honest and upright feudal scholar-officer with strong concern with his county. His political ideals obviously had a feature of West Capitalism, but, in fact, a feature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from the basis of his ideals instead.

**Key Words:** Liu Guangdi; Confucian;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of 1898